蔡东藩先生生平简介

蔡东藩（1877—1945）名郎，字椿寿，萧山县临浦镇人。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中秀才。数年后，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称病即归，从事教书生涯。

辛亥革命后，内乱外患，国力日衰。蔡感叹万分，忧心殷殷，怀着“演义救国”之志，愤笔撰写演义，寄托其爱国忧民的情思。他热望通过演义中的历史知识，借鉴古人、古事，劝戒世人，匡救时弊。经山阴好友邵希雍介绍，和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建立联系，他写的演义书陆续问世。著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西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等，记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的2166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全书共1040回，600余万字。民国二十四年，会文堂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4集40回，全都改印，总书名《历代通俗演义》，分装44册。其中《清史演义》是最早的一部，完稿于1916年；最后一部《后汉演义》脱稿于1926年9月。仅在10年时间里，独力完成这样一部大跨度、系统完整的历史演义著作，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这是他作为一位埋头苦干的历史学家、演义作家对祖国作出的惊人贡献。他还善诗，撰有《留青别集》和《楹联大集》等专著。

蔡东藩是一位老教育家。他的毕生事业，除十年历史演义著作，其余时间，大都在杭州、绍兴及故里执教。蔡主张革新语文教学，修改过邵希雍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

蔡东藩一度潜心研究中医，回乡养病期间，与当地医界过从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密，并在长于医道的岳父指导下，著有《内科临证歌诀》4卷。

蔡东藩为人正直，不阿时好，生活简朴，洁身自持。

今年农历6月13日是蔡东藩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这位历史名人，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忧民和埋头奉献的精神，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蔡东藩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发起单位：

中共萧山县委宣传部
萧山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
萧山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萧山县文化局
萧山县教育局
萧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萧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临浦镇人民政府
所前镇人民政府
萧山县文化馆
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

1987年7月

祭祖父文

孙福恒　福源　福绥

维公元1987年7月8日（丁卯年六月十三日），孙福恒、福源、福绥等偕党政首长、专家学者、亲戚友好，凭吊墓前，敬祭祖父之灵。

祖父生不逢辰，命途颠扑。列强入侵，军阀互戮。椿萱咸凋，手

足尽覆。国难家愁，危机四伏。难能可贵，自勉自勖。排瘴除雾，勤奋好学。不愿合污，执缨自濯。武昌炮响，共和如旭。精神振作，誓雪耻辱。赤子情深，为我民族。

盲瞽陆沈，世人受束。正视历史，借以教育。努力秉笔，丹心之光照千秋，千秋增辉；积极成书，青云之志垂万世，万世流渥。十载辛劳，巨著累牍。气华日月，声溢金玉。前无古人，雄才荦荦。盛矣哉，硕果丰盈，举世瞩目。巍巍青松，令人钦服！

而今三中全会，扬清抑浊。党和政府，高瞻远瞩。政通人和，万众幸福。集会纪念，各道衷曲。孙辈数人，心动如瀑。荷蒙亲诲，遗愿定续。振兴中华，实为主轴。告慰先灵，虔诚肃穆。

在蔡东藩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副县长　盛昌黎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明天是我县著名历史人物——历史学家、教育家、历史演义作家、爱国主义者蔡东藩先生的诞辰。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县文联、县文化、教育、文管部门及蔡东藩先生的生葬地临浦、所前两个镇人民政府等11个单位发起，今天组织了县级党政群机关干部、离退休老同志、工会、共青团的骨干、人民教师、电大文科班学员、县文协会会员和县区乡的文化干部300余人，在这里隆重举行蔡东藩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我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活动。我代表县府，对这次纪念活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今天应邀参加我县纪念活动的来宾有，从上海远道赶来讲学的我国著

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教授和他的夫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高家莺副教授，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刘寅生；有杭州来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审、社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刘耀林，杭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校昌，杭州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主任汤洵；有宁波大学客座教授、湘师教师杨钧和省、市、县新闻单位的代表；还有蔡东藩先生的亲属。大家的到来，使我们的纪念活动得到了指导和帮助，为我们的纪念活动增添了光彩。我谨代表中共萧山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和全体发起单位，向来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蔡东藩先生1877年生于临浦，1945年逝世后葬于所前。他的一生，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这一时期，正是我们国家处于动荡多变，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蔡东藩先生洁身自持，不逐名利，痛恨清廷官场的腐败，毅然弃官从教，并埋头写作历史通俗演义，完成了从前汉到民国前期，前后贯串2千多年历史，长达6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写的是演义小说，却十分注重历史真实，为普及历史知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蔡东藩先生治学严谨，知识渊博，他不仅写了长篇历史演义，还给后人留下了教学著作、医学著作和诗集，这是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蔡东藩先生热爱祖国，不畏权势，在他的著作中，敢于针砭时弊，讴歌辛亥革命，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总之，蔡东藩先生的一生，是不阿时好，清贫自守，默默奉献的一生。

时代不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已摆脱了蔡东藩先生那个时代的一切屈辱和苦难，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经济振兴，民族团结，人民生活由贫困向小康过渡的伟大时期。今天我们纪念蔡东藩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高贵品德；学习他勤奋好学，默默奉献的工作态度。以此激励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

针，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双百方针”，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深化改革，强化农村村级经济，搞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三大召开，为把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我们对蔡东藩先生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可以说还知之甚少。今天有许多位学者专家前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活动，为我们讲学，进行学术座谈，这对我们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和帮助。我希望通过这次纪念活动，把我县对蔡东藩先生的研究工作，积极地开展起来。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蔡东藩
《元史演义》的史料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名誉主任
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吴　泽

去年六月间，我在浙江萧山召开的蔡东藩学术纪念会上做了一次《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研究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兹就讲话中关于蔡东藩《元史演义》的史料与史料学部分整理成文，发表出来，恭请方雅多多指正。

一

元起漠北，本乏纪录，仅有的一些载籍，又多蒙文土语。元朝也曾有《实录》，那是从元世祖开始的。世祖以前，特别是蒙古先世的事迹，史料奇缺。明初史官修元史，由于文献不足，确实执笔困难。再加，编纂时间又较短促，仓促完稿，不易完善。故《元史》问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多有滋议，实非史官之失。虽然，明清两代以来，学者辈出，《元史》外，先后撰有商辂等续编《纲目》、薛应箕等撰《通鉴》、陈邦瞻撰《纪事本末》等。其中《元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撰，凡27篇，但所用史料，不出《元史》和商辂等所撰《续纲目》的范围。如蔡东藩在《元史演义》的《自序》中所说：这些元史著作"体制不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疏漏固犹昔也"。至于《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史》和《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等书，记有太祖、太宗和世祖、顺帝史事。其中《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作者佚名，原文蒙古文，已失，现行的《元朝秘史》为汉字写本。书中所载元太祖先人谱系，太祖生平事迹等，虽与《圣武亲征录》等书互有异同，可资参证，而且书中还保存有很多蒙古古语词和古语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对元史的整体研究来说，并未提供较多的新史料，从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的观点来说，估计过高是不确切的。所以，蔡东藩在写作《元史演义》的过程中，要搜集较多的写作史料，对上述一些史书的史料价值，是有所体会的。他在《自序》中说：前二书（《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史》）所记史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后二书（《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所记，也只是些"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蔡东藩的这个评论，我认为还是较为持平的。

明清两朝以来学者撰有《蒙古源流》和《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其中《证补》一书是清人洪钧所著，共20卷。是洪钧任驻俄公使时，汇集俄人译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所撰《史集》中《部族志》、《成吉思汗本纪》和亚美尼亚人多桑所撰《蒙古史》，命使馆馆员译为中文，并参证其它史料，著成此书。这是我国学者利用国外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部著述，史料价值较高。对《蒙鞑备录》和《蒙古源流》二书，蔡东藩以之与《元朝秘史》齐观说："亦一秘史类耳"。这样评说，也是较为确切的。

二

蔡东藩编写《元史演义》时，正因史料特别是蒙古西征和四汗国的史料匮缺，所以对洪钧的译著非常重视，他自己也说：

> “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

可是，据他自己说：“寻以材力未逮”，没有做成，只是“戏成演义，都六十回”。蔡东藩在写《元史演义》时，在元史史料匮缺的情况下，他能如此专意于史料的收集、鉴别，故在应用史料时，选择、评论都是有一定分寸的。特别是在应用《元史》与《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正史与稗史之间“异同”处，做了较为细致、审慎的“参证”工作，不随便滥用。

研究元史运用史料，由于蒙古语词、语法、特别是人名、地名、官职名等译文不一，发生很大困难，一名数译，应用时常易误一人为二人，甚至误为三、四人；误一地为二地，甚至误为三、四地。所以应用时必须先做一番考核工夫，否则，难免错误。

蔡东藩在《元史演义》中，遇有译名分歧不一者，都作注释，例如：第一回写到蒙古族先世远祖乞颜氏时，解释“‘乞颜’说：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写到朵奔巴延时，下注“《元史》作托奔默尔根，《秘史》作朵奔蔑尔干”。写朵奔巴延妻阿兰郭斡时，下注：“旧作阿兰果火，《元史》作阿伦果斡，《秘史》作阿兰豁阿”。写朵奔巴延长子布尔古讷特、次子伯古讷特时，下注：“《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衮德依”。第二回写也速该时下注：“《元史》作伊苏克依”；写也速该妻诃额仑时，下注：“《元史》作谔楞，《源流》作乌格楞”。第三回写帖木真时，下注“亦作铁木真，《元史》作特种津”。第六回写到木华黎

时，下注：“《秘史》作木合黎，《源流》作摩和赍，《通鉴辑览》作穆呼哩”。第十回写帖木真部下追杀太阳汗，蔑里吉部酋脱黑脱阿遁走时，下注：“即《元史》脱脱”。写帖木真即大汗位，自称成吉思汗事，正文中解释说：“‘成吉思’三字的意义：成者大也，吉思，最大之称”。下注云：“《元史》作青吉斯”。第十一回写成吉思汗率三子统领大军攻打金营时说到长子术赤，下注：“《元史》作卓齐特，”说到次子察合台，下注：“《元史》作察罕台；”说到三子窝阔台时，下注：“《元史》作谔格德依。”特别是第四回中写到有关克烈汪罕事，在正文下注：“《元史》作汪汗”外，第九回的评论中还说：

> “《元史》称汪罕为克烈部，所居部落，即唐时回纥地，疑汪罕非部名，乃人名也。然《本纪》又云，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则王罕又非人名；若以汪王同音，罕汗同音疑汪罕为称王称汗之转声，则应称克烈部汪罕，何以史文多单称汪罕，未尝兼及克烈乎？《太祖纪》又云‘克烈部札阿蚶孛者，部长汪罕之弟也’。即云部长，又云汪罕，词义重复。要之蒙汉异音，翻译多讹，本书以汪罕为统称，以脱里为专名，似较明显，非谬误也。”

案：汪罕本名脱里，是克烈部长。他的父亲忽儿札胡思死后，嗣父位为汗。后因他残杀兄弟，被逐，投奔帖木真父也速该，在也速该的支持下，回克烈部复汗位。也速该与汪罕结为“安答”（契交之意）。帖木真势弱时，曾到脱里处，并尊脱里为父，叙父子之礼。后来脱里声势日盛，金丞相完颜襄伐塔塔儿时，他奉金檄，合攻塔塔儿，因军功；金封他为王。其后，遭乃蛮部攻击败走时，得帖木真之助，联兵大败乃蛮部。后来，札木合又联合诸侯大军来攻，在阙奕坛一役中，又大败札木合军。因此，脱里声威益盛，他即是克烈部汗，又被金封爵为王。因此，时人不再称其脱里本名，而尊称他为王汗。“王汪同音，汗罕同音”，渐讹译为汪罕。王罕或汪罕，本非人名，而是一种封号，是对脱里的尊称，沿称久了，

成为统称，甚至讹译成人名了。蔡东藩说："本书以汪罕为统称，以脱里为专名，"是确当的。第三十六回写泰定帝初政，册定皇后弘吉剌氏，名叫巴巴罕时注云："特书其名，一正《元史本纪》误名为氏之讹，一正后来下嫁燕帖木儿之罪"。写并立皇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时，在阿速吉八名下注云，"一作阿苏奇布"。第三十九回写泰定帝死，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尊皇后弘吉剌氏为皇太后，拟定次年改元天顺事时，注云："泰定帝在位五年，其子已早为储贰，依父终子及之例，则阿速吉八之嗣位，亦属正当，故特书改元，以存书法"。这种"误名为氏"之错误，在古史研究中虽不多见，《元史本纪》中有此误，加以是正，是必要的。阿速吉八以泰定帝之储贰嗣父位，"改元天顺"，就改元之"书法"说加注"特书改元，以存书法"，也是必要的。

还有：元史中常有尊崇"某某皇帝"的蒙古语尊称。特别是一些用蒙文写成的诏敕，不加注释，读者是不易读懂的。蔡东藩《元史演义》第三十五回写铁失等杀了拜住，弑了英宗，迎晋王也孙铁木儿在龙居河旁，受了御宝，即皇位发诏布告天下事，钞录《元史》所引原文时，边引边注说：蒙文诏中之薛禅皇帝，蒙语尊称，世祖为薛禅皇帝，薛禅云者，聪明天纵之谓。诏中谓："在后完泽笃皇帝"下注："蒙语称成宗为完泽笃皇帝，完泽笃者，有寿之谓"。诏文还提到"扶立了两个哥哥"，写到"曲律皇帝"下注云："蒙语称武宗为曲律皇帝，曲律者，杰出之谓"；写到"普颜笃皇帝"下注"蒙语称仁宗为普颜笃皇帝，普颜笃者有福之谓"。这类注释，也完全有意义的。或谓，紧接上文"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下，不是还有"侄硕德八剌皇帝"吗？为什么对"硕德八剌"不加注解说？是否因蒙语难解呢？案：《元史·成宗本纪》记成宗时说：成宗，"讳铁木耳，世祖之孙裕宗其金第三子也"，死后，"庙号成宗，国语曰："完泽笃皇帝"。纪武宗时说：武宗"讳海山，顺宗答剌麻八剌之长子也"，死后："庙号武宗，国语曰曲律皇帝"。纪仁宗时说：仁宗，"讳爱育黎拔力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达，顺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死后，“庙号仁宗，国语曰普颜笃皇帝”。是知成宗名铁木耳，武宗名海山，仁宗名爱育黎拔力八达。“国语”，“即蒙语也，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是上文所说蒙语对成宗、武宗、仁宗之尊称。《英宗本纪》纪英宗，“讳硕德八剌，仁宗嫡子也”。死后，“庙号英宗”，“上国语庙号曰格坚”。格坚是蒙古语庙号，非蒙语尊称。《明宗本纪》纪明宗“讳和世㻋，武宗长子也”，死后，仅有“庙号明帝”四字，既没有蒙语尊称，连英宗死后的“国语庙号”也没有了。是知“硕德八剌皇帝”的硕德八剌，是英宗名，不是成宗、武宗、仁宗那样的什么“蒙语尊称”。蔡东藩对英宗的硕德八剌未下任何注解，无何误失处。把英宗皇帝名硕德八剌看作蒙语尊称，那才正是误失了。

三

再如地名，不仅是国内的，特别是国外的地名，各书译文，更是紊乱，写历史演义书时，不对各书地名译文的“异同”处，作一番审慎、细致的“参证”工作，是很难着笔的。蔡东藩写作《元史演义》时，随时注意这种“参证”，全书不知化了多少注释笔墨。例如：在第一回中写蒙古先世远祖活动地理时，写到阿兰郭斡死了，孛端察儿在兄弟分家后离家流浪在斡难河，到了巴尔图鄂拉，下注：“鄂拉，蒙古语，山也”。第六回写太阳汗会同札木合，不亦鲁黑联军攻打铁木真，军至乞湿勒巴失海子时，注云：“海子亦称淖尔，为蒙古语，犹华人之言湖也”。同回写帖木真在古连勒古山游猎时下注：“古连勒古山，即桑沽儿河所出。”第三回写金邦强盛，并有辽地，复兴兵南下，据三镇时，下注：三镇，“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第九回写帖木真与汪罕矛盾斗争事，提到“三河之地”时，下注：“三河指土拉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皆为汪罕所居地。”第十二回写成吉思汗定议西征后的几回中，在西征途中所经今中亚细亚境内的许多国名、城名、地名，各书译文又很

紊乱，他在写作时，确也费了很大心力，做了很多“参证”工作。第十四回写成吉思汗接到哲别率领的大军已西逾太和岭并战胜钦察援军，进兵阿罗思的军报时，分别在太和岭下注：“即高加索山”；阿罗思下注：“即俄罗斯”。第十八回写蒙古军南下钦察，霍都思汗遁走马加部时，在马加部下注云：“马加即今之匈牙利；”写速不台、拔都蒙古军勇敢善战，欧罗巴州全土震动，捏迷思诸部民均欲荷担远遁事，在捏迷思下注：“即今之德意志”。第六十回写帖木耳率领蒙古军统一西域后，便南略印度，旋因突厥遗种阿斯曼国部长名巴贾塞脱，连结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国，夹击帖木儿属地时，在阿斯曼国下注：“即今土耳其国”。接着，还叙述“帖木耳即还军拒战，一战破埃及军，再战擒巴贾塞脱，略定小亚细亚全境”。把帖木耳蒙古军破埃及军，擒阿斯曼国部长，略定小亚细亚全境的史事说得原原本本，清清楚楚。蔡东藩写《元史演义》时，对元代时中外历史地理确是作了一番考核工作的，较之明初人编撰的《元史》中的历史地理部分翔实得多。他在第十八回的评语中说：

> “拔都西征钦察，即今俄罗斯东部；至分军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在东欧地矣。波兰近为俄、奥、德三国所分（近自欧州大战德，败俄乱，欧洲各国始许波兰独立），马加即匈牙利也，匈牙利之北，即奥大利亚国。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国或合或分，今则合为一国，故又名奥斯马加。蒙古军亦曾至奥斯地，奥斯马加之西，即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速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也。明·宋濂等修《元史》，因欧、亚之地理未明，故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近儒所译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本回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

这里说匈牙利之北“即奥大利亚国”，“亦称奥斯。”“奥大利亚国”，疑是奥地利国之误。我们知道，奥大利亚在今澳洲，马加是匈亚利，位今东欧地区，马加怎么与奥洲的奥大利亚“或分或合，今则合为一国”呢？显然，奥斯是指奥地利言的，马加与奥斯“合为一国，”也即匈牙利与奥地利合为一国，合称之曰奥匈帝

国。蔡评中奥斯“即奥大利亚国”的说法，是欠当的。或谓此“智者之失欤”！智者之失，“亦可鉴也”。（编者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东藩《元史演义》第150页，即18回蔡氏评语中直陈“……匈牙利之北，即奥地利国，亦称奥斯……”）

蔡东藩在第十三回中写成吉思汗西征途中遭遇花剌子模王的抵御，经历多次大战事，对有些地名、人名作了必要的注释。如写成吉思汗听到谟罕默德引兵驻撒马耳干时，正文中点出谟罕默德为“花剌子模王”；撒马耳干下注：“《元史》作薛迷思干”。写谟罕默德出走时，母妻居乌尔鞬赤城，下注：“《元史》作玉龙杰赤”。写成吉思汗接到侦报，谟罕默德长子札兰丁，与班里城主蔑力克汗联合抵御时，分别在班里下注“《元史》作班勒纥”；蔑力克汗下注“《元史》作灭里河汗”。写成吉思汗率军令养子失吉忽秃忽进军到喀不尔时，下注：“一作可不里，即今阿富汗都成”。写札兰丁败逃，奔到河边，复被忽秃忽军堵住，走投无路时，纵马上一高崖，“连人带马，投入印度河中去了。”指出札兰丁投河是投的印度河。蔡东藩写札兰丁投印度河时，便结束了。下写“未知札兰丁性命如何？请看官续阅下回”。蔡东藩写到这里，正是笔就心顺！忘乎所以，紧接上文写了以下一段自誉自赏的自评：

> “本回叙成吉思汗西征事，皆在今中央亚细亚境内，《元史》所载甚略，余如《亲征录》、《元秘史》、《元史译文征补》等书，亦皆错杂不明，令读者茫如测海，几有望洋之叹。一经作者叙述，逐层分析，依次表明，自觉井井有条，不漏不紊。若并是书而以为难阅，则从前史乘，更不必过问矣。本书所载地理，南北东西各有分别，阅《元史》地图自知。看似容易恰艰辛，阅者幸勿滑过”。

《元史演义》是蔡东藩在公元1920年（亦即民国九年）写成的。就当时元史研究的水平来说，能写出这样一本元史演义来，我们自应予以应有的肯定和评价。或谓，以前的旧小说演义书，如《三国演义》等等中的评批注释，每多染饬之词，《元史演义》是蔡

东藩自著的，正文中的注解和每回后的评语，都是他一笔自注、自批、自评的，似应有所区分，少些染伤之词。我认为他自评中真能把“错杂不明，茫如测海”的南北东西地理，表得如此“井井有条，不漏不紊”，使读者一目了然，增添科学的历史地理知识，作为一位读者，为他的“自慰”、“自傲”之情感到欣慰，感到傲岸。而且，他惟恐读者不了解他写这本书的一番苦心孤诣似的，情不自禁地脱笔自豪自叹地说：“看似容易恰艰辛”！并叮咛“阅者幸勿滑过”，他用演义书的评语法对读者等抒其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真情实感、“艰辛”和寄寓处，我认为有意义的。

四

蔡东藩写《元史演义》时，对旧史书之官名、国号、称号乃至改元等事，有所简略失漏或前后错乱之处，也随笔下注或作评语加以补充、纠正，务使读者能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这也是具有一定的史料和史料学的历史价值，值得一写。

例如：在《元史演义》第五十五回中写丞相脱脱奉旨出征，规复徐州时，下有并命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事捌思监、也可扎鲁忽赤福寿，从脱脱出师事的“也可札鲁忽赤”六字下注云：“此六字，系元代官名”，在“福寿”二字下注云：“坊间小说有赤福寿，想系福寿以上误添一赤字，遂致以讹传讹”。在第二十回中写忽必烈班师称汗，登大位，改元立号，曾诏告天下，说是“仿中夏建元体例，定为中统元年”。诏文中还说；“法《春秋》之正始，体太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在位五年，又“复改中统为至元”，后“又建国号曰元”。当时有一敕文云：“……即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蔡东藩前文写：“小子此后叙述，称蒙古为元朝，又因至元十六年，忽必烈汗灭宋，奄有中国，殁后庙号世祖，所以后亦竟称元世祖。阅者不要误会，说我称号两歧。”作为一本元史的通俗演

义之作，作者能对读者这些易生歧异的紊杂处作这样严肃认真的“参证”和“注释，并给读者以深入浅出的史料与史料学知识，是有必要的，有意义的。

妥欢帖睦尔继位时，改元元统，庙号顺帝，他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他即位的头三年里，连年京畿大火，黄河泛滥，两淮亢旱，山崩地裂，天变无常。顺帝不“顺”，他想：世祖至元年号，寿祚最长，下诏说：“弭灾有道，善政为先，更号纪元，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元朝之所以有两个“至元”年号，《元史演义》第五十回叙述得很清楚。蔡东藩一面利用监察御史李好文疏文中的话，抒发已见。李文云，“年号袭旧，于古未闻，且徒袭虚名，未行实政，亦恐无益，”“写出时弊十四条，言比世祖时代的得失，相去甚远，结果是陛下有志祖述，应速祛时弊，方仰承祖统”云云；一面借李好文之口说：“目今下诏改元，仍复至元年号，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闻”，“难道改了‘至元’二字，便可与全盛时代，同一隆平么？”两个至元年号，如何使读者加以区分呢？好多本《中国历史纪年表》专著中，都未注意说明。蔡东藩紧接上文解释说：

“改元诏书，乃是元统三年十一月中颁发，史家因顺帝已经改元，遂将元统三年，统称为至元元年。或因世祖年号，已称至元，顺帝又仍是称，恐后人无从辨别，于至元二字上，特加一‘后’字，以别于前”。蔡东藩写元史演义时，能对顺帝时的至元年号在正文中作如此严肃认真而又详实通俗的“参证”、“解说”，是一般历史小说中所罕见的。这对读者是又一次有益的史料学的历史教育。

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卒年、年寿问题，长期来各家说法不一。《蒙古源流》和《元史·太祖本纪》等均说“岁次壬午”生，壬午，即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亦即公元1162年；死于“丁亥七月”，丁亥，即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亦即公元1227年，

享年66岁。其后，清代学者邵远平、魏源、曾廉等多承此说。波斯人拉斯特《史集》和清儒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均说成吉思汗生于宋绍兴二十五年、金贞元三年，即公元1155年，享年72岁。其后清代学者法承钧、屠寄、柯绍忞等均承此说。

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对成吉思汗的生卒年寿作了详细的考证，並写成专文，题名《太祖年寿考》，附在书中，洪钧的观点是一承拉施特《史集》的1155年生和享年72岁说的。蔡东藩的《元史演义》虽然是在1920年写成的，未及看到拉施特书，确曾详阅了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但他对成吉思汗生年、年寿问题上，没有受拉施特、洪钧之说的影响，而是直宗《元史》之说的。

从蔡东藩《元史演义》全书的序文、注释、评语中所引用主要史料文献是《元史》、《蒙古源流》、《元朝秘史》、《蒙鞑备录》、《元史译文证补》等，而且大量应用，引证的还是前三种。例如：第六回中写帖木真擒杀薛撒别吉，又见他子博尔忽时，下注："《秘史》作孛罗兀勒"。写帖木真在回军途中遇着札剌亦儿种人，名叫"古温豁阿"时，下注："《元史》作孔温窟哇"；写"引着数子来归，有一子名木华黎"时，下注："《秘史》作木合黎，《源流》作摩和赍，《通鉴辑览》作穆呼哩，亦为四杰之一"。《蒙鞑备录》在蔡东藩考证史实、人物等时也引用不多。只是在第四回中写"锁儿罕失剌、博尔术送帖木真赠的一些马奶儿、肥羔儿等礼物时，正文中蔡东藩紧接着写了句"复笔"说："小子尝阅《蒙鞑备录》，方知蒙地宜牧羊马，凡一牝马的乳，可饱三人，出行时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本书据实叙录，因复有此复笔"。蔡东藩确是把《蒙鞑备录》当作"秘史"看，当作演义"复笔"之用的。

蔡东藩在《元史演义》中对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是很推崇的，在他的《自序》中说：

"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

《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两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阙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

《元史演义》第十回写帖木真杀了札木合，率领大军凯旋东归，到了斡难河故帐，旋即大会部族，为部众拥戴为皇帝，并由阔创议加“成吉思”三字之尊称。“遂择日祭告天地，即大汗位，自称成吉思汗。”这件大事，蔡东藩在正文中先写这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冬月”，接着，注了“大书年月”四字。在第十一回接着前回说：“看官记着，是年岁次丙寅、即为成吉思汗即位之元年，历史上就称为元太祖元年。蒙古人以寅年肖虎，称为虎儿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元太祖元年，即公元1206年，亦即“岁次丙寅”的虎儿年。

《元史演义》第十二回写成吉思汗攻金回军事说成思汗时“年已花甲”，并下注：“成吉思即位之年，已五十二岁，此时已逾八年，正六十岁了。”太祖八年癸酉，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正六十“花甲”也。第十五回写成吉思汗决意亲自南征西夏时对他的臣下屈指道：“我即大位，已二十年，西北一带，总算平定，只南方尚未收服，必须亲往一遭，就使今冬不征，明春定要讨哩”。太祖二十年乙酉，是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同回中，写成吉思汗占据了贺兰山，拔黑水等城，后又陷灵州城，已是寒冬，命将士在行帐度年的军事情况后，写到“转眼间腊尽春回，已是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了”时，下注“复书岁次，为成吉思汗道殂张本”。案：《元史·太祖本纪》载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后，连破洮河西宁，拔德顺等州。”六月，夏主李睍降，“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营。”“寿六十六”，“在位二十二年”。“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正是宋宝庆三年，亦即公元1227年，是则，自此六十六年前的1162年，不正是成吉思汗的生年吗？是知蔡东藩写《元史演义》时，在采用前人文献资料，遇有各种不同的争论时，他是下过一番史料考证功夫，严加择抉的。所以，他不为洪钧《元史译文征补》所影响，一承《元史》之说，贯

通全书的。特别在史事纪年上，每遇重大史事，无不随笔注出年号、年代。一本历史演义书，能如此地重视史料与史料学，可见其史学修养有素，自非一般小说演义作家所能出此手笔的。

五

蔡东藩著《元史演义》第一回，追术蒙古源流时，写到先世祖孛端叉儿和他的父亲朵奔巴延和母亲阿兰郭斡史事说：朵奔巴延生二子，即夭亡，阿兰郭斡寡居，又连生三个儿子，旁人议论纷纷，阿兰郭斡密语前二子道："你等道我无夫生子，必与他人有私情么？那里知道三个儿子，是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后，并没有什么坏心，惟每夜有黄白色人，从天窗隙外进来，将我腰屡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怀着了孕，连生三男。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久后他们做了帝王，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阿兰郭斡还说什么："你以为我捏谎么？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暧昧情事！你若不信，试伺我数夕，自知真假！"当天晚上，二子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至黎明方出，于是二子"也有些迷信起来"。

第一回下半回中还写阿兰郭斡死后，五子分家，哥嫂以孛端叉儿年幼，没有分授家宅的资格，只得离家流浪巴尔图山一带，在山上驯养一只黄鹰，与黄鹰生熟分食。后来孛端叉儿的幼弟不哀哈搭吉来寻找，兄弟二人起程回家。这些情节，确够离奇，所写文笔，也够演义小说味道。难怪有人认为历史演义与故事小说有何区分！"何以史为"！

元史演义，由于文献不足，实难下笔，特别是蒙古先世事迹，本乏纪录，成吉思汗建国后，虽有些载籍了，也多蒙文土语，所记也多鄙俚不雅驯之说，即或所谓之"正史"的《元史·太祖本纪》，所记孛端叉儿和其父母兄弟的事迹，也多神怪等奇离、鄙俚之辞。事实上，蔡东藩所写的这回情事，全是以《元史·太祖本纪》为依据，并参酌《蒙古源流》和《元朝秘史》写成的，不过以通俗演义的笔法加以综合，铺演，使之形象、生动，便于读者而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